

「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許雪姬*

摘 要

日記資料陸續出土，成為臺灣史研究有別於官方史料的重要史料之一，是近一、二十年的事。連續性、跨時代且長期性的日記，既是衝決斷代、結合兩個時代重要而關鍵的史料；又能傳達有異於掌握治權者觀點的歷史敘述，為研究者所不能忽視。臺灣日記研究的展開，雖有賴於記主家屬的諒解與承諾，也應歸功於經過句讀、解讀、數位化、出版、召開研討會，最終完成日記知識庫的建置，這一系列前置性作業。現今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建置的「臺灣日記知識庫」，方便學術界同時檢索、利用多種日記，更幫助了上百位博、碩士生完成其論文。近來日記的研究，不只限於研究日記的內容，而逐漸重視研究個人精神史與時代氛圍，並經由不同記主針對某些政治事件的反應，來了解其認同。經由本文對臺灣日記研究的介紹，可知臺灣史學界研究日記的過程、成果與現況，以及往後擴充日記知識庫的內容、多召開研討會，加強與國外學者的交流，並增加日記研究人數，是未來要邁進的方向。

關鍵詞：日記、日記研究、臺灣日記知識庫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通過刊登：2015 年 1 月 22 日。

- 一、前言
 - 二、日記與臺灣史研究
 - 三、臺灣日記研究的進程與成果
 - 四、日記研究未來的方向
 - 五、結論
-

一、前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接著統治臺灣，1949年12月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打敗，中央政府遷到臺灣；本來是邊陲性存在的臺灣，一躍而為「中央政府所在地」，遂將統治全中國的框架遷移至臺灣。戰後1945-1949年之間，有識之士如楊雲萍，不斷有奪回臺灣史書寫權的說法，也在臺灣省編譯館（1946年8月設立）設置「臺灣研究組」，並於1947年9月在臺灣最高學府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臺灣史課程。¹然而好景不常，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後，緊縮政治空間，臺灣史的研究也跟著限縮；臺灣史被稱做「中國地方史」，並以「抗日史觀」做為闡述日治時期的基調。1987年未解嚴以前，學院內有關臺灣史的研究以研究清領臺灣時期（1684-1895）為主，主要是沒有語文上的障礙和「意識型態」的問題。日治時期的研究除了抗日史外，其他範圍均遲遲未進。原因是年輕一輩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語文工具不足；且學院中未設日語系所致。以國立政治大學來說，1956年設置東語系，其下有俄語、土耳其語、馬來西亞語、韓語、日語組，²學習日語的人數有限，臺灣學日語之風再現也要等到1980年以後。1997年臺灣總督府所留下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臺灣拓殖

¹ 許雪姬，〈戰後史觀與臺灣史研究（1945年7月-1987年7月）〉，收於呂芳上主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臺北：國史館，2012），頁158-164。

² 國立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設於1956年，其下陸續成立俄語組、韓國語文組、土耳其語文組、阿拉伯語文組、日語組，待1998年日語組才獨立成系。

株式會社」開始進行數位化工作，方便使用第一手史料，再加上日治時期相關雜誌之數位化，促使更多年輕人投入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並成為主流。

由後殖民理論來說，被殖民者即使在主權上脫離了宗主國，但政治、經濟、文化上仍將處於依附與被殖民的狀況。³ 戰後研究日治臺灣史是否仍仰賴過去殖民者的日本學者所使用的日本觀點？而即使能以臺灣觀點來做研究，不過使用的史料都是殖民者所留下，⁴ 如何不被牽著鼻子走，並奪還臺灣的「歷史解釋權」，是重要的課題。環顧荷西統治與鄭氏王朝時期，並沒有留下臺灣人觀點的史料，清領時期要到割讓前後才有臺灣人為記下慘痛的一頁而書寫。⁵ 日治下除了臺灣人創刊的《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臺灣大眾時報》／《新臺灣大眾時報》能體現臺灣人觀點外，另一值得重視的是日記。除了臺灣人的日記外，各朝官僚、外省籍人士⁶ 以臺灣為場景敘述的日記，有可能異於政府的觀點，也值得參考。

本文將利用各種已、未出版的日記，以及各種利用日記完成的論文，對臺灣日記的研究，做一回顧過去、策勵將來的說明。

二、日記與臺灣史研究

(一) 日記的定義與類型

1. 定義：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行事、感知寫作文字而成，是個人較私密性的記憶。有人如記流水帳，有人擇要而記，有人要有感覺才寫，形式、內容不一而足。日記往往因記主⁷ 回味過去、做為參考而存在，並沒有出版的打算；但也有記主

³ 葉郁菁，〈臺灣移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國際文化研究：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報》3: 1 (2007年6月)，頁55-76。

⁴ 楊雲萍，〈紀念先烈〉，《民報》，1945年10月10日，第2版。楊雲萍稱：要紀念先烈，替被誣為「土匪」的先烈翻案，「但是除去敵人的記錄以外，我們竟沒有絲毫的史料」。

⁵ 洪縵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瀛海借亡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本書分上、下兩卷，談乙未之役和截至1906年臺灣人的抗日活動。

⁶ 所謂外省籍人士，廣義來說包括日治時期以華僑身分居住在臺灣者，以及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來臺的中國人，特別是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來臺者。相對於外省人，臺灣人稱本省人，指1945年8月15日前就住在臺灣，擁有日本籍者。

⁷ 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東京：新人物往來社，歷史讀本特別增刊第21号，1994)，凡例。但亦有稱為「記者」，參見佐藤進一，〈日記の分類〉，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頁36。

已預設自己的日記會出版而寫。⁸ 寫日記的人都知道，保存日記是一種負擔：擔心遺失、被偷看，緊急時必須銷毀、天災時無法搶救，自己過世後家人隨意棄置、與人俱亡，因此能保留下來的日記（特別是較長期者），史料價值特別珍貴。

2.類型：中國學者馮爾康依日記內容、性質，分為生平日記、學術日記、差事日記及其他日記（如旅行日記），⁹ 實則不分類、全稱生平日記，亦無礙於對內容的了解。日本學者佐藤進一則以記主的身分，分為天皇·皇族的日記，公家的日記，武家的日記，農民、商人的日記；若用記主的職業區分，則有政治家、軍人、實業家、作家等日記。¹⁰ 如果依日記內容仔細分類，臺灣日記還可分出「獄中日記」、¹¹ 「宗教日記」、¹² 「女性日記」。¹³ 不論如何分類，都只是有助於了解多種日記的實質內容和特色而已。

3.範圍：以臺灣為書寫場域，不論書寫者是否為臺灣人。如橫跨清末、日治時期的《馬偕日記》（1884-1901），是在淡水牧會的加拿大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長達 18 年的日記。¹⁴ 還有臺灣人在臺灣域外所寫的日記，如部分《楊基振日記》是在北京、天津所寫。¹⁵ 另外，非以臺灣為場域，也非臺灣人所寫，但日記中提到臺灣人者也列入研究範圍，如《鄭孝胥日記》、¹⁶ 《周佛海日記》。¹⁷

⁸ 德永康元，〈私の日記論〉，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総覧〉，頁 38。

⁹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 刷），頁 160。

¹⁰ 佐藤進一，〈日記の分類〉，頁 36。

¹¹ 如〈賴和獄中日記〉、〈簡吉獄中日記〉、〈蔣渭水日記〉，以上可參見楊麗祝，〈獄中日記三則：蔣渭水、簡吉與賴和〉，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上册，頁 311-378。

¹² 鍾平山，〈教會日知錄〉（臺北：弘智出版社，1985），這是臺灣岡山浸信會牧師 1965 年的日記。白聖長老，〈白聖長老日記（一）至（廿二）〉（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9 年修訂再版），此日記始於 1965 年 8 月 5 日，終於 1989 年 2 月 28 日，前後長達 24 年。

¹³ 女性的日記特別少，因之可分為一類。目前已知時間較長者有〈杜潘芳格日記〉，已出版一部分，即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東京：總和社，2000）；另有日治時期士紳之妻的日記《楊水心女士日記》（已出版）、〈陳岑女士日記〉及少女日記〈高慈美女士日記〉。

¹⁴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馬偕日記〉（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共 3 冊。

¹⁵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臺北：國史館，2007），共 2 冊。日記始於 1944 年，終於 1950 年，其中 1946 年 5 月以前都是在中國唐山、天津、北京所寫。

¹⁶ 鄭孝胥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共 5 冊。這部日記始於 1882 年，終於 1938 年，其中 1914 年 11 月 2 日起開始出現臺灣板橋林家的林薇閣（林熊徵），至 1932 年滿洲國成立前後，就不斷出現臺灣人相關的記載，如謝介石、許丙等人。

¹⁷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分為上編、下編。自 1940 年 3 月 29 日起出現臺灣人彭盛木的名字，時任汪政權財政部參事，亦為周佛海的日語翻譯。

（二）日記（尤其是長時間日記）的重要性

日記是個人私密性的記載，如果僅有一年，未能看出來龍去脈，用處有限，如果是較長期性的日記，則為當代重要的資料。目前在臺灣有關日記最長者，是長達 60 年（1917-1972 年）的〈蔣介石日記〉，尤其是中華民國的統治者，其日記價值高，但因存在版權爭議，尚未正式公開。〈黃旺成日記〉現存 1912-1973 年（中缺 13 年）；〈黃繼圖日記〉始於 1929 年，止於 1979 年（中缺 5 年），黃旺成、黃繼圖父子的日記時間重疊長達 44 年，可互相參照，更是研究家族史的瑰寶。以下探討日記的重要性。

1. 日記是研究記主的頂級資料：日記雖因記主的敘事風格，而對事情的記載有輕有重，但隨著記主在社會上扮演的不同角色，也會保留不少當時重要的資料。以 2013 年底剛出版完成的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27 冊）為例，日記中就至少有四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一、臺灣總督府組織「皇民奉公會」的各項活動；¹⁸ 二、戰後發生的「臺灣獨立事件」；三、1947 年二二八事件；¹⁹ 四、戰後在日本從事的臺灣獨立運動。²⁰ 前三項他都是事件中人，第四項是觀察者，其日記為研究上述事件不可不參考的資料。

2. 日記是研究婦女史、家族史、生活史的重要素材：女性史的研究為目前學界所重視，但 1945 年以前較少女性資料，尤其是家庭主婦，而日記中記主筆下的書寫範圍，包括他身邊的女性。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他留下子女、夫妻、母子、寡嫂、情婦、發生性關係女性的記載，被他記入的女性躍然紙上。²¹ 除女性外，核心家族和家族的成員、姻親、僕役、佃人都會記載在內，使閱看者能了解該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及其社會網絡。至於記主的閱讀、醫療、

¹⁸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 年 6 月），頁 167-211。

¹⁹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於胡健國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頁 989-1061。

²⁰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 207-217。

²¹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該局，2005），頁 69-121。

休閒、交友、宗教信仰情形，也可在日記中看到。²²

3.日記為記主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可能回憶失真與太多迴護自己空間的回憶錄、自傳、口述歷史。以皇民奉公會為例，戰後中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後廣泛調查相關名單，以致跨越兩個世代的臺灣人物傳都刪除參加皇民奉公會的經歷，²³《灌園先生日記》則毫無隱藏地記載他為該會從事的各項活動。

4.日記提供平民觀點的歷史素材，有異於統治者的制式說法——天下無不是的政府。臺灣總督府留下許多統計資料，以數據來直接證明日治時期是進步的、現代性的，如果缺少各記主的看法，那麼研究日治時期的臺灣史就只能歌頌日本的統治，而無法發掘臺人背後的心酸。又如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其原因，政府的說法與《灌園先生日記》、《吳新榮日記》所載就大有不同。

（三）日記取得與使用的困難

依目前初步的統計，以臺灣為場域的日記有數十本，這個數字在臺灣號稱400年史而言不算多。由於中、日兩國人都有寫日記的傳統，中國方面據說最早者為808年李翱的《來南錄》；²⁴列入日本最早的日記是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寫於838年。²⁵那麼臺灣最早的日記是那一本呢？也許是荷蘭司令官雷爾生入據澎湖的日記，²⁶寫於1622年。臺灣本地人所留下的日記，最早可能為李春生寫於1896年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²⁷何以本地人留下的日記數目有限，這就牽涉到以下因素：

²² 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731-789；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791-840。

²³ 許雪姬，〈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師大臺灣史學報》4（2011年9月），頁41。不過戰後這些人的傳再也沒有相關皇民奉公會的記載。

²⁴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頁160。本書也提出日記最早可溯源他人為歷代帝王所寫的起居注，如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漢明帝《明帝起居住》。但本文不談論非自己所寫的日記。

²⁵ 佐伯有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頁74-75。

²⁶ 村上直次郎譯，〈司令官コルネリス・ライエルセンの日記〉，與《巴達維亞城日記》同收於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史料雜纂》。日文文本未出版，已有中譯本。另《巴達維亞城日記》日文譯本始自1621年，但因司令官的日記確實記載澎湖，故仍認定其為最早。

²⁷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李春生著作集（4）：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天演論書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4），頁169-228。

1.臺灣天災多，尤其是颱風、水災、地震，使文物不易保存，遑論日記。

2.臺灣有些習俗不利於文物的保存，如家人過世後會將其生前用過的日常用品丟棄，相關照片、文件燒掉。1990年筆者在臺中縣（今臺中市）調查傳統民宅時，為瞭解始創的宅主（因門的方位依宅主吉凶尺寸製做），乃進行宅主後代的訪查。有好幾家人都說先人過世後已經燒掉相關文字資料及照片，無法提供，令人感到無比遺憾。

3.日記中有不少寫及家族成員隱私的部分，因此不願提供學界。有些家族較為積極，會節錄有關公領域的部分出版，但流通量有限，如曾任臺中縣縣長何金生的日記。²⁸

4.臺灣因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1949年後戒嚴（至1987年才解嚴），這段期間發生不少政治事件，被找出的日記就成為羅織罪名的證據，因而家屬或記主在害怕之餘，莫不銷毀或「匿藏」。以文學家呂赫若（1914-1950）為例，其日記僅存1942-1944年，乃因戰後他從事「反政府的工作」，家人擔心留下的手稿、書籍會為家屬帶來二次傷害，乃挖坑埋掉，並在上面潑了幾桶水。惟一倖存的一本日記，是因該日記記載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下來。²⁹又如吳新榮醫師《吳新榮日記》，他在二二八事件後知道會有危險，乃將日記包裝後埋在椰子樹下，³⁰出獄後再掘出，部分日記因沾染濕氣而使文字暈出。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在日本所寫部分，家屬先由日本帶到美國，再託一位任職華航機長的姻親，利用其通關不必開箱檢查的機會帶回。³¹日記難以保存、傳承，可見一斑。

至於與臺灣人相關的日記，使用上也有其困難，如語文的多樣性。如前所述荷蘭人司令官以荷文書寫，而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中被俘的英國人 Robert Gully

²⁸ 何金生著、何家班整理，《百里侯掠影》（2006），為日記節錄本，節錄何擔任臺中縣縣長1,400多個日子的日記。另一本則是其自1954年擔任第二屆臺灣省議員，任「山地文化巡迴工作隊」領隊，帶領30多位隊職員數次深入崇山峻嶺的經過，節錄出版為《翻山越嶺三年汗：全省山地走透透的省議員》（2005），兩書均由其女兒何菊香、何桂香、何寧香編輯，但每本僅20部，出版地、出版者均未列。

²⁹ 呂芳雄，〈後記：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收於呂赫若著、鍾瑞芳譯、陳萬益主編，《呂赫若日記》（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第2冊：（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頁492。

³⁰ 吳南圖，〈序〉，收於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頁9。

³¹ 林博正，〈《灌園先生日記》序〉，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ii-v。

和船長 Franck Dunham 在處刑前留下的日記，³² 則以英文書寫。在臺日本人所寫的日記，大半是日文，如《初山衣洲日記》，³³ 但也有以漢文書寫者，如《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³⁴ 臺灣人所寫的日記可謂語言駁雜，有日治時期以日文書寫，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即改用中文書寫，如《吳新榮日記》、《楊基振日記》；若干日記也有以漢文書寫，但夾雜少數專有名詞、藥名用平假名表示，或使用與漢文用法不同的日式漢文，如「敷衍」；也有直接使用日式漢文，如「便當」、「主催」、「貸切」、「株」等；臺語（有時稱閩南語）有教會羅馬字拼音系統，稱「白話字」，《楊水心女士日記》就可見到。³⁵ 為了方便閱讀者，編註者往往將外文日記均盡量譯成中文，如之前所提《呂赫若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³⁶

（四）日記使用的有限性

日記雖然提供了很多研究的素材和多元的觀點，但日記資料並非萬靈丹，在使用上也有其限度。

1. 日記記載相對有失簡略：以《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來說明。1933年霧峰下厝林朝棟夫人楊水萍的葬禮，記主林、張都去參加。葬禮前一天（10月23日），林獻堂寫的是如何與喪主林瑞騰敲定葬禮，³⁷ 張麗俊則記

³² Robert Gully et Dunham Frank, *Journal Kept by Mr. Gully and Captain Dunham during a Captivity in China in the year 1842*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4).

³³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20: 4（2013年12月），頁179-204。

³⁴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³⁵ 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1、4、6-9、13-17、28-32。1928年1月中1、2、4、6、8、9、12、13、14、15、17、18、19、20、21、29、30、31日均用白話字寫，其餘以漢文書寫，但有時會用同音字來替代，如「廣」（講，kong²）電話。日文的「貸切」寫成「大切」（tai⁷ chhiat），同音。

³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一九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一九一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一九一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四）一九一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該日記自1912年至1915年2月16日以日文寫，因此逐日譯成中文於後。黃旺成也有用臺語書寫的時候，如「險一險」（hiam²-chit⁸-hiam²，好險）。

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1933年10月24日，頁411。

載楊水萍逝世 3 年停棺不葬，乃因在中國的姪子欲向叔父林瑞騰分養贍金，叔不給，纏訟 3 年才得下葬之事，還做〈輓楊太夫人仙遊〉一詩致悼。³⁸ 葬禮當天（24 日），林獻堂記載前來會葬者和葬儀中各人的角色，更及於送葬諸親友的姓名和送葬至何處。³⁹ 張麗俊則重視會葬的總人數、各種排場，及為了用汽車運靈柩還修造橋路，所費不貲。葬式改良從簡，宴席只 23 席。⁴⁰ 上述兩日記雖各有重點，但林較簡略，必須有張的日記來補足。

2. 日記主觀性強，使用時必須小心：日記中留下不少批評第三者的資料，也許被批評者不至於如此不堪，但因記主主觀的描述，不免令讀者對被批評者產生負面的看法。以蔡培火的日記為例，他寫到蔡惠如臨終時對待小妾的不堪情形，⁴¹ 《灌園先生日記》也引述了蔡培火的說辭，⁴² 使蔡惠如的後人在寫其生平事蹟時免不了要辯誣。⁴³

3. 日記資料敏感性高，有時難免要割捨：雖然由學術立場來看，敏感性的史料更具價值，但若涉及私生活，有時要全文照刊不免有些為難。因為私生活（尤其是性生活）涉及雙方，男性的敘述不免是「片面之辭」，如涉及薦寢，在出版時須多加考慮。《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張麗俊與情人、風塵女子燕好的描寫，未免有「風俗太卑」之感，但又不能否認日記內容所描寫的女性百態，確為研究社會史的好材料。⁴⁴ 又如《楊基振日記》有更細密的私生活描寫，出版時這部分就只好割捨。⁴⁵

³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李毓嵐、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4），1933 年 10 月 23 日，頁 309-310。

³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1933 年 10 月 25 日，頁 413。

⁴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李毓嵐、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3 年 10 月 25 日，頁 311-312。

⁴¹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1929 年 5 月 20 日，頁 94。

⁴²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1929 年 5 月 23 日，頁 149。

⁴³ 謝金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11-112；謝金蓉，〈重新尋找蔡惠如〉，收於謝金蓉，《青山有史：臺灣史人物新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86-87。

⁴⁴ 〈序〉，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李毓嵐、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0），頁 1。日記出版之時是否要刪除這部分，曾開會討論，幸得記主之孫張德懋云，「如果將日記刪減、潤飾後再出版，將無法完全呈現當時的社會型態與現象」，於是決定隻字不刪。

⁴⁵ 國史館曾與日本愛知大學教授黃英哲、家屬討論，決定刪除這些具私密性的資料後出版。由於沒有標示刪節處，因此不知內情者不會知道《楊基振日記》並非足本。

4. 日記中的人名、暱稱、別稱、簡稱難以判讀，尤其同一人有數種稱呼或同名者數人更難判明：以人際關係最複雜的《灌園先生日記》為例。林獻堂日記中對親族的稱呼總是以他為中心的稱法，如南街嫂、彰化奶、縣庄奶等，有時不知所指為何人；對往來親友皆省其姓、直寫其名，於是「國城」出現就要知道究竟姓謝還是姓藍，碧霞、聰明也各有兩個須要判別。前述南街嫂許悅，是他大堂兄之妾，因出身彰化南街故稱，後來出家又叫「德真」。林獻堂的小舅子名楊添財，又叫楊天佑、楊雲鵬，若不明究竟，恐怕會誤認為三個人。

為了提高日記的使用性，日記的解讀變得十分重要。

三、臺灣日記研究的進程與成果

目前利用日記史料進行記主研究與完成學位論文的人數愈來愈多，但由於日記是個人私密性的史料，因此由取得到開放應用，必須在記主去世後 50 年，⁴⁶ 或得到後代家屬代表（往往是保存者）的授權同意才能進行，但也時常有非家屬代表的家屬提出異議，這時就必須多方溝通才能解決問題。眾所周知〈蔣介石日記〉本由其子蔣經國的第三媳婦蔣方智怡同意出版，但遭到蔣經國長孫女蔣友梅反對，於是所有的出版工作停擺。如果出版、使用等問題解決了，日記可以公開，學者固然可進行研究，但不少記主的日記資料內容具地方性、駁雜性，若非經過解讀、出版、建立資料庫，則難以使用，更難引起研究生或研究者的興趣，影響史料市場不小。以下談論日記研究的進程和成果。

（一）解讀、研究日記

1. 組織「日記解讀班」進行校訂、解讀的工作：為了使更多人參加日記研讀，集思廣義而成立的解讀班，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的「日記解讀班」為例來說明。此解讀班的成員以臺史所的研究員為主，加上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研院博士培育計畫、博士後研究、短期訪問學人、訪問學員，以及臺大、政大、師大歷史研究所學生組成。除了臺史所研究員為主

⁴⁶ 如購得、擁有他人的日記，欲出版或使用，必須要在記主逝世 50 年後才可進行。

體長年參與外，其他教授、研究生則是階段性參加，大約在 20 人上下。目前國內的日記解讀班有 3 個，⁴⁷ 中研院臺史所 2 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1 個，解讀的日記為〈黃旺成日記〉（每星期一次，許雪姬研究員主持，自 2007 年展開，已出版 13 冊日記）、〈吉岡喜三郎日記〉（每月二次，鍾淑敏副研究員主持，自 2014 年展開。此日記為吉岡後人贈予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臺史博解讀〈陸季盈日記〉（由謝仕淵主持，每月一次）（見表一）。日本也有殖民地官僚《內海忠司日記》的解讀與出版。⁴⁸ 至於解讀工作的進行，首先用電腦輸入日記全文、標點，解讀時先由每個月 1 或 2 人負責校對，並做人、時、地、事物與情境背景的解說，之後於解讀班進行校訂、確認與補充，再由助理加以整理，經主持人確認後成為定稿。

表一 臺灣史日記解讀班

單位	解讀日記名單	解讀頻率	主持人	參與成員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旺成日記	每週一次	許雪姬	所內研究人員、博士後、博士培育計畫研究生、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吉岡喜三郎日記	每月二次	鍾淑敏	所內研究人員、博士後、博士培育計畫研究生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陸季盈日記	每月一次	謝仕淵	大學教授與館內研究人員

說明：筆者整理。

2. 進行相關口述歷史以為補充：近二十多年來臺灣口述歷史有很大的進展，這門新興學門，也成為解讀日記的助力。由於日記中有太多以文字資料、上網都難以找到的人、事、物，因此口訪取得的資料，往往成為解讀日記的重要資料。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例，筆者個人曾訪問林家親屬、朋友，尤其是晚年記主旅居日本時的秘書、朋友，部分成果付梓，⁴⁹ 成為研究林獻堂、霧峰林家非參考不

⁴⁷ 1999-2013 年中研院臺史所曾組「林獻堂日記解讀班」，每週一次，每次兩個半小時。有關本班的成員、進行情況，可參見許雪姬，〈跋：《灌園先生日記》全套廿七冊出版完成記〉，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493-504。

⁴⁸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近藤正己、北村嘉惠編，《內海忠司日記（1940-1945）：総力戦体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

⁴⁹ 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分為頂層篇、下層篇，共訪 19 人。此外尚有 13 人的訪談紀錄未出版，但仍可做為學術研究之用。

可的資料。

3.出版：普及日記史料的方法之一即出版，由解讀完成到定稿，一冊（約1年）還需經過1-2年的出版過程，如非由學術機構出版，一般出版社很難應命。

4.召開研討會：日記解讀、出版告一段落後，為突顯研究成果，也為了讓參加解讀者有發表的園地，更為答謝提供日記的後代親友，召開研討會乃屬必要。茲列舉如下。2000年12月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中研院臺史所的前身）召開「日記資料與臺灣史研究：以田健治郎日記為中心」學術研討會；⁵⁰ 2004年《水竹居主人日記》10冊出版完成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與「近代史學會」、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召開「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並於2005年底出版《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2月中研院臺史所與林獻堂後人所辦的「明台高級中學」合作，舉辦「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會後出版《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共上、下兩冊）；2010年8月中研院臺史所與國立中興大學、2012年10月與國立臺史博，分別舉行了日記相關的研討會。2013年，中研院近史所召開「日記中的性別」研究工作坊。⁵¹ 2014年11月中研院臺史所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醫學大學合開「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會中共14人發表論文，內容包括政治事件中個人日記資料的角色；記主的理財、經營會社與當時的物價；記主在獄中的各種時間、行醫紀事、感情生活，以及官員日記中有關鴉片及專賣制度的記載。其間所交互使用的日記達十多種，其中尚未出版者有〈池田幸甚工作日誌〉、〈陳懷澄日記〉。

（二）建立日記資料庫

1.授權：有鑒於私人資料對比於公家檔案的重要性，日記的可遇而不可求，以及經由網路搜尋可迅速讀取等因素，建置日記資料庫，以提供研究素材、平衡只有統治一方的資料，乃為當務之急。誠如上述，日記具有私密性且內容會提到第三者，是否引起家族及第三者的不快，則是建置資料庫的隱憂。在評估建立資料庫時，取得記主嫡系子孫的同意為首要之務；其次是解讀者的授權，第三是出

⁵⁰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即將出版時召開，該書於2001年出版。

⁵¹ 此工作坊共發表13篇論文，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13年7月30日-8月2日舉辦。

版單位的同意。

2.校訂：為了將錯誤率減到最低，因此將已出版的日記和日記原稿再度委請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進行校對，並針對日記中某些書寫方式，如俗字加以統整，並在資料庫後臺開放討論區，以利達成共識。

3.建置：中研院臺史所是臺灣最早建立日記資料庫的學術單位，2008年3月確立以 wiki 作為系統開發工具，先以《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做為數位加值的標的物。由於這兩套日記都有詳細的解讀，因此也包括解讀檔。而後陸續加入《黃旺成先生日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簡吉獄中日記》、《三好德三郎回憶錄》，以及向其他出版單位取得的《呂赫若日記》、《吳新榮日記》、《楊基振日記》等共九種（見表二）。

此外，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目前仍有部分日記，因家屬的要求與館際合作授權問題，暫時無法開放數位化功能。一般使用者若有利用需求，必須親自到館使用，該日記也無法提供複印，僅能人工抄錄（見表三）。

4.開放與使用：2009年9月中研院「院區開放日」時於院內開放，10月配合中研院臺史所「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向學界及社會大眾進行推廣。由於反應不錯，也未出現後遺症，因此於2011年9月正式對外開放，凡國內學術研究者與公務員皆可使用（以 edu.tw 或 gov.tw 電子郵件認證申請）。目前「日記知識庫」已有 926 萬字（後臺正在處理者超過 300 萬字）。⁵² 迄 2014 年 11 月底截止，系統連線瀏覽頁面已達 333,297 頁次，隨著收錄日記內容新增，並配合相關研討會與展覽活動的推廣，連線使用數量逐年成長。而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中研院臺史所「日記知識庫」者有 353 人（刪除重複人次），引用單位包括臺灣史、歷史、臺灣文學、中國文學、法律、音樂、藝術與政治等領域的研究所，其中以《灌園先生日記》169 次最高，《水竹居主人日記》146 次居次，這還不包括專書及期刊論文的引用數據（見表四、表五）。中研院臺史所「日記知識庫」的網址如下：<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

⁵² 王麗蕉，〈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介紹〉，收於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282-289；許雪姬，〈日記與臺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週報》1460（2014 年 3 月 27 日），頁 6。

表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收入日記一覽

日記名稱	數位影像典藏單位	時間	備註
灌園先生日記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1927-1949年	已出版，1950-1955年未上線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1906-1937年	已出版並上線
楊基振日記	國史館	1944-1950年	已出版並上線
呂赫若日記	國立台灣文學館	1942-1944年	已出版並上線
吳新榮日記	國立台灣文學館	1933-1967年	已出版並上線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日本國會圖書館	1919-1923年	已出版並上線
黃旺成先生日記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1912-1919年	僅部分出版、上線
簡吉獄中日記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1929-1930年	已出版並上線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1988-1938年	已出版並上線（原件家屬留存）

說明：筆者整理。

表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未開放線上數位化利用日記一覽

日記名稱	所載時間	原件(冊)	徵集方式	數位資源	所屬全宗
高慈美日記	1929-1932年	4	捐贈		3GCM 高慈美文書
堤林數衛日記	1929-1937年(缺1933)	8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資源系統	T0777 堤林數衛文書
邵毓麟日記	1953.4-1975年	10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資源系統	T1009
吉岡喜三郎日記	1909-1937年(缺1913、1920)	20	捐贈	臺灣檔案資源系統	T0747
陳懷澄日記	1916-1932年(缺1917、1923、1929)	16	數位典藏		T0791
石井光次郎日記	1917-1920年	4	影印典藏		T0896

說明：筆者整理，本欄中日記均可親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流通室利用。

表四 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八套日記人數一覽

日記名稱	引用該套日記人數	備註
黃旺成先生日記	20	中研院臺史所解讀出版
灌園先生日記	169	中研院臺史所解讀出版
水竹居主人日記	146	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解讀出版
簡吉獄中日記	19	中研院臺史所解讀出版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58	中研院臺史所解讀出版
楊基振日記	9	國史館解讀出版
呂赫若日記	60	國立台灣文學館解讀出版
吳新榮日記	30	國立台灣文學館解讀出版

說明：本資料以2014年7月25日為檢索截止日，參照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知識系統」可供線上檢閱資料，將其與中研院臺史所「日記知識庫」所收錄之八套日記相互比對整理而成。

表五 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灌園先生日記與水竹居主人日記學年度分析

學年度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日記															
灌園先生日記	3	5	5	5	7	6	10	16	18	17	26	19	23	21	1
水竹居主人日記	3	3	5	2	6	6	12	14	24	25	16	17	14	14	0

說明：筆者整理。

(三) 利用日記研究記主並成為全集的一部分

1. 記主的研究：日記素材是研究記主一生最重要的資料，如黃富三，《林獻堂傳》（2004）；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張嘉元，〈呂赫若研究〉（2002）。

2. 研究記主日記：以研究《水竹居主人日記》為多，如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賴恆毅，〈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2006）；中興大學臺文所黃琇紋，〈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之臺灣文學史料分析〉（2008）；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2008）；亦有人研究簡吉的獄中日記，如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王妙花，〈簡吉《獄中日記》研究〉（2011）。

3. 編全集的重要資料：《蔡培火全集》有 7 冊，其中第 1 冊家世生平與交友，即載有其 1929-1936 年的日記；⁵³ 《劉訥鷗全集》共 6 冊，其中包括其 1927 年的日記（上、下）兩冊；⁵⁴ 《鍾理和全集》有 6 冊，第 5 冊收錄其 1945-1959 年的日記。⁵⁵

(四) 日記資料的研究成果

以下舉例就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簡介如下：

1. 社會史：生活中有不少社會史的面向，可以多種日記來了解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前後幾天（尤其是 15 日當天）域內外臺人所受到的影響。由日記得知，8 月當月物質生活變動不大，但 9 月以後社會秩序日趨紊亂，報復日本人的行動頻傳，民間不得不自行維持治安；米價日昂，也引起社會不安；至於臺灣

⁵³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83-392。

⁵⁴ 康來新、許秦蓁編，彭小妍、黃英哲編譯，《劉訥鷗全集·日記集》（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2001）。

⁵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總編輯，《鍾理和全集 5：鍾理和日記》（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7）。

人到底站在那一邊？認為是戰勝或戰敗？則只能說，如果記主認同回歸中國，無疑地認為自己是戰勝國的一端。⁵⁶

2.政治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本地士紳與日本少壯軍人諫山春樹、中宮悟郎商談臺灣是否拒絕中華民國的接收而自治／獨立？由於安藤利吉總督反對，乃告胎死腹中。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臺後，於1946年1月17-27日進行「臺灣漢奸總檢舉」，將一千臺灣士紳逮捕，史稱「臺灣自治／獨立」事件。向來研究此事件的有關素材，以《大公報》、⁵⁷《現實》⁵⁸所載1947年7月判決時的報導為第一手史料；其次則為蘇瑤崇所寫〈再論辜振甫謀議臺灣獨立案〉，指出所謂「獨立事件」，發起者乃臺灣人，不是日本人，也未查到「中宮悟郎」其人。⁵⁹如果能運用《灌園先生日記》，就可知道事件的部分真相，與林獻堂何以未被逮捕。⁶⁰

3.精神史研究：利用日記中個人在家庭的角色，釐清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特質，建立中產階級的心靈圖像，再結合年鑑學派的精神史研究，了解記主在當代所呈現的公、私領域。黃繼圖自1929年中學時期開始用日文寫日記，直到1972年。政大臺文所曾士榮副教授利用其迄1955年的日記，完成臺灣第一本利用日記研究精神史的專書，⁶¹政大臺史所博士候選人莊勝全為其寫書評，⁶²有中肯的

⁵⁶ 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2008年12月），頁151-178。

⁵⁷ 《大公報》，1946年1月19日、29日，2月1日。

⁵⁸ 彭翰（臺北特派記者），〈臺灣《自治》陰謀案紀詳〉，《現實》1（1947年7月），頁5-8。

⁵⁹ 蘇瑤崇主編，《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6年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36-44。這點阿部賢介的專書中已證實確有其人，畢業於日本陸軍中野學校。參見阿部賢介，《關鍵的七十一：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向》（臺北：國史館，2013），頁161。

⁶⁰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頁992-995。林獻堂為事件當事人當時留下日記資料最可信者，有別於許丙之子許伯埏的回想。參見許伯埏，〈台灣獨立計畫に參画？——父の拘留から釈放まで〉，收於許伯埏著，許雪姬主編，蔡啟恆、川島真日本語編集，傅奕銘中文摘譯，《許丙·許伯埏回想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298-299。另根據林熊祥兒子林衡道的說法，係陳儀欠林熊祥款項屢催未還，遂懷恨在心，才逮捕之。參見許雪姬，〈林熊祥先生事蹟考：日治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三〉，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該系，1998），頁442-448。由黃肇珩等人所寫有關辜振甫參入的另一說，參見黃天才、黃肇珩，《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95-100。據說此一運動是由辜振甫向政府告發：「當我獲悉日本軍人妄動以後，鼓起勇氣，立刻通報日軍領導人，得以制壓國家亂源，我盡了匹夫之責」。

⁶¹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

說法。

4.音樂史：臺灣音樂史大半存在於學院中的音樂教育，演奏、作曲、音樂家的記載，較少提及根本稱不上樂隊的團體，主因是史料不足徵。音樂系出身的高雅俐，耙梳《灌園先生日記》中談到「霧峰音樂會」（漢樂）的籌組、練習、演出、研究，並及個人扮演的角色；此外，研究士紳家族成員如何學習鋼琴、與近代臺灣音樂菁英的交往，士紳還組成繹樂軒（劇團）、霧峰管絃樂團，⁶³ 如非有林獻堂 1920-1930 年代的日記，這一 1930 年代值得記載的音樂史將不得彰顯。

除了政治、社會、精神、音樂史的研究成果外，文學史、婦女史的研究更具成績，已如上述不贅。

（五）多種日記的資訊出現與取得

由於利用日記做研究已漸有成果，日記知識庫的設置方便利用，因而臺灣、日本民間也樂意將日記提供掃描，完成建置日記知識庫的先決條件。見「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典藏日記一覽」目錄，三好德三郎、吉岡喜三郎、池田幸甚、田健治郎、堤林數衛、初山衣洲的日記，都由其後代或典藏單位合作提供，有些如下村宏、石井光次郎、南弘日記，則影印自日本國會圖書館。至於臺灣部分，去年取得者有〈傅錫祺日記〉（1898-1945 年，中缺 10 年，共 35 冊）；〈陳懷澄日記〉（1916-1932 年，缺 3 年，共 16 冊），兩部日記都已完成全文輸入，並已校對完畢（見表六）。〈邵毓麟日記〉，則是中華民國前駐韓大使邵毓麟留下的日記（1953-1975 年，共 10 冊）。至於死於白色恐怖的醫師葉盛吉，其日記以日文書寫，自 1938-1950 年，共 23 冊，預計將於 2015 年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合作，進行日記的中譯工作。此外，經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協助，本年初已取得《劉訥鷗日記》、《熱蘭遮城日記》置入「臺灣日記知識庫」的授權。

臺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據云除上述《陸季盈日記》外，亦陸續有人捐贈。

⁶² 莊勝全，〈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臺灣史研究》20: 3（2013 年 9 月），頁 207-220。

⁶³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 841-902。

表六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日記一覽

	日記名稱	所載時間	原件 (冊)	徵集 方式	數位 資源	所屬全宗
1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1888-1938年	4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T0875 三好德三郎文書
2	初山衣洲日記	1898-1912年(缺 1908-1911)	9	數位典藏		T0891 初山衣洲文書
3	傅錫祺日記	1902-1946年(缺 1926、1928、1930、 1934-1935、 1938-1939、 1943-1945)	35	數位典藏		T0889 傅錫祺文書
4	張麗俊日記 (水竹居竹主人日記)	1906-1937年	27	數位典藏	臺灣日記 知識庫	3CLJ 張麗俊文書
5	吉岡喜三郎日記	1909-1937年(缺 1913、1920)	20	捐贈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T0747 吉岡喜三郎文書
6	黃旺成日記	1912-1973年(缺 1918、1920、1932、 1938、1940、1944、 1947-1948、1952、 1954、1965、1967、 1969)	48	數位典藏	臺灣日記 知識庫	T0765 黃旺成及黃繼圖 文書
7	池田幸甚工作日誌	1914-1923年	4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IKE 池田幸甚文書
8	下村宏日記	1915-1921年	7	影印典藏		T0895 下村宏文書
9	陳懷澄日記	1916-1932年(缺 1917、1923、1929)	16	數位典藏		T0791 陳懷澄文書
10	石井光次郎日記	1917-1920年	4	影印典藏		T0896 石井光次郎文書
11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 日記	1919-1923年		數位典藏	臺灣日記 知識庫	T0818 田健治郎文書
12	林玉雕日記	1923-1989年(缺 1924、1934、1938、 1939、1941、1944、 1950、1951、 1954-1956、1961、 1983、1985-1988)	10	數位典藏		T0689 林玉雕文書
13	張木林日記	1925-1939年(缺 1926-1927、1929、 1932、1938)	10	捐贈		T0832 張木林文書
14	林獻堂日記 (灌園先生日記)	1927-1955年(缺 1928、1936)	25	數位典藏	臺灣日記 知識庫	T0748 林獻堂文書
15	楊水心日記	1928、1934、1942年	3	數位典藏		T0748 林獻堂文書
16	簡吉獄中日記	1929.12-1930.12	1	數位典藏	臺灣日記 知識庫	T0894 簡吉文書

	日記名稱	所載時間	原件 (冊)	徵集 方式	數位 資源	所屬全宗
17	高慈美日記	1929-1932 年	4	捐贈		3GCM 高慈美文書
18	堤林數衛日記	1929-1937年(缺1933)	8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T0777 堤林數衛文書
19	黃繼圖日記	1929-1972 年 (缺 1937、1947、 1952-1954)	39	數位典藏		T0765 黃旺成及黃繼圖 文書
20	南弘日記	1931-1933 年	9	數位典藏		T0876 南弘文書
21	吳新榮日記	1933-1967 年 (缺 1934、1954)	45	影印典藏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臺灣日記 知識庫	3WXR 吳新榮文書
22	葉盛吉日記	1938-1950 年	23	數位典藏		T0728 葉盛吉文書
23	呂赫若日記	1942-1944 年		內容加值	臺灣日記 知識庫	
24	楊基振日記	1944-1950 年		內容加值	臺灣日記 知識庫	
25	邵毓麟日記	1953.4-1975 年	10	數位典藏	臺灣檔案 資源系統	T1009 邵毓麟文書

說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四、日記研究未來的方向

日記研究除賡續以往的研究外，日記本身的研究盲點與必須加強之處，也有擴充日記知識庫的必要，並應增加日記研究者的人數，行有餘力則可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分敘如下。

(一) 日記研究的盲點

研究者僅注意日記書寫的內容，未能進一步討論日記使用的極限。過去的日記研究，往往重視其所能提供的資料做為各方面研究之用，或用來研究記主，似乎並未健全考訂的機制。如與同時期、同日而不同記主記載的對比；或與當時的報章雜誌做比較，才能明白記主在日記中的描述以何為重？那些部分未被描述？描寫的正確度如何？也才能知道，當日記內容沒有其他資料參證時，可信度如何？

1. 記主在日記中寫什麼？什麼不寫？以〈陳懷澄日記〉為例，日記內容記載他擔任鹿港區長、街長的行事，購閱的書籍，為人刻印、合奏樂器，與朋友和歡

場女子的嬉遊，和妾燕好的感受，但對重要的社會事件卻未必有太多的書寫。以1930年連雅堂遭櫟社社員開除出社為例，他是最先發動者。⁶⁴ 3月2日報紙漢文版一刊出〈附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一篇如右〉，贊成臺灣總督府再發鴉片特許牌照，4日陳懷澄即寄信給林獻堂，僅說：「夜寄一緘請灌園除連某名」。⁶⁵ 13日召開櫟社理事會，決定以其不熱心於本社而議決連雅堂退社。當日陳懷澄堅持非開除不可，⁶⁶ 但他在日記中並無一語及之。⁶⁷ 如上，就可約略了解記主寫什麼、不寫什麼。

2.記主書寫同一人卻用不同稱呼，是否代表不同意義？如黃旺成在日記中對妻子林玉盞的正常稱呼是「內人」，其妻不會打理家事時常罵「蠢婦」，1928年開始有外遇後，則稱妻子「玉君」，背後意義為何？耐人尋味。反之，其外遇對象，原書寫上均直呼其名「李招治」，情意相通時則稱「愛菊」。黃旺成號菊仙，故如此稱呼。由上可知，光由稱呼即能讀出黃旺成情感的變化，也並非如林獻堂自始至終稱其妻為「內子」；而林獻堂之妻楊水心則稱丈夫為「主人」(しゅじん)。

3.記主日記的私密性如何？以今日看日記的角度來說，有絕對的私密性，然而《灌園先生日記》、〈黃旺成日記〉、〈黃繼圖日記〉是否絕對私密？以林獻堂來說，他是每日早晨書寫前一天的日記，寫完後很可能放在書桌上，因此夫人楊水心很容易看到，這點由1930年的日記可以看出端倪。楊水心日記記載她與丈夫不同的行程，但對於相同的行事或家族分產訴訟事，則大半引用丈夫的日記。⁶⁸ 如

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1930年3月6日，頁76：「三〔二〕日連雅堂曾在《台日》報上發表一篇，說……，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

⁶⁵ 陳懷澄，〈陳懷澄日記〉(未刊稿)，1930年3月4日。

⁶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1930年3月13日，頁84：「槐庭再提議雅堂於三月二日在《台日》紙發表阿片意見書云云，……，非將他除名不可」。

⁶⁷ 陳懷澄，〈陳懷澄日記〉(未刊稿)，1930年3月13日：「開理事會於霧峰南強宅。」不及其他。唯在3月10日日記上有如下記載：「接傳社長來書，請訂古曆十四開理事會於霧峰，革連氏出社」。

⁶⁸ 如1930年4月16日的記載為例，林獻堂日記：「……她(阿雨)今朝來復余，仍堅執昨夜主張之兩條件，毫不讓步，……九時半同五弟往臺中招子瑜會武井檢察官，告以阿雨受人使，而反對和解決約書之事。」楊水心日記：「本早阿雨來回復主人，堅執為昨夜主張之兩條件，毫不讓步。至九時半主人同五叔往臺中招子瑜去會武井檢察官，告以阿雨受人使【弄】而反對和解。」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129；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169。

果這樣的推測接近事實，則林獻堂在書寫上恐有些顧忌，因而感情問題或會引起妻子懷疑、不快之事，便不會寫入。⁶⁹ 反觀黃旺成，妻子林玉盞不識字，不必擔心被看，因此召妓、與外遇對象李招治的情史，都鉅細靡遺地寫入。⁷⁰ 其子黃繼圖早在 1932 年就已打開他的秘密箱子，得知其情史，相對的黃繼圖自 1929 年開始寫日記，1931 年 5 月起黃旺成為了瞭解兒子而開始看兒子的日記。⁷¹ 其妻雖看不懂，但也會透過兒子偷看黃旺成的日記，⁷² 甚至連他的情婦也要求觀看。⁷³ 而黃繼圖日記中有妻子阮木筆將結婚 4 年來積壓的情緒書寫在上面，⁷⁴ 可見她能看到丈夫的日記。由此看來，日記雖具私密性，但對家人就不具絕對性，甚至以日記作為表白自己感情的證明，多少影響記主的書寫範圍。林獻堂的堂嫂陳岑，據她在 1924 年 11 月 28 日日記所載，由於日記被長子偷去兩本，可見並非放在絕對安全之處，她為此燒掉日記。⁷⁵ 這又是另一可做參考的資料。

（二）發揮日記研究的特色

日記研究對各方面的歷史都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但其重要特色之一的生活史，有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而日記本身的書寫、敘述與特別的用法，甚至使用的日記本也值得研究。略述如下。

1. 生活史 (life story)：簡言之，是指個人一生或一團體建立之後的全部過程，特別指針對長期生活上的社會文化情況進行詳盡的記述，並分析影響個人或團體生活的因素。日記因逐日記載生活中各種活動、想法，因此其中記載的物價、飲食、交通路線、休閒生活、交友圈，都是研究生活史重要而連續性的資料。

⁶⁹ 林獻堂晚年與負責照顧孫子博正的秀玉有婚外情，在其妻發現前，日記未有記載，發現後則記載其妻如何解決此事，以及秀玉在分手後，經常求見林獻堂要求各種補助。

⁷⁰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刊稿），1929 年 4 月 17-19 日。

⁷¹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頁 59-61。

⁷²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刊稿），1929 年 8 月 25 日：「玉君（即黃旺成妻子）詰問愛菊名稱是誰？……想是叫繼圖偷看我的日誌」。

⁷³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刊稿），1928 年 10 月 3 日：「她求看予日誌，予不許。」她指黃旺成的外遇對象李招治，其實在這之前李招治早已看過黃旺成的日記，才會做此要求。參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刊稿），1929 年 7 月 14 日：「及後看予之日誌才了解」。

⁷⁴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頁 200。

⁷⁵ 陳岑，〈陳岑女士日記〉（未刊稿），1924 年 11 月 24 日：「今早檢查（大正）十一年日記，閱畢付炬。」；1924 年 11 月 28 日：「余出外書房拾歸余大正五年及七年日記，因被逆子偷去二本，係十年餘，盡皆付丙。」目前僅剩 1924 年的日記。

2.婦女／女性史：女性向來較少為自己發聲、留下紀錄，前已述及目前已出版的女性日記，大概只有杜潘芳格的部分日記；因而男性日記所記載的身邊女性資料，儘管充滿主觀、偏見，也不得不視為重要史料來源。通常會被記載的女性，除妻子外，可能還包括母親、女兒、妾、女性親戚、外遇對象、歡場女子等，由其中可知男性記主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傳統要求」，多少也可知道記主們的女性觀。多位男性記主的女性觀，亦有可比較之處。

3.文化史：記主的購書、閱讀習慣，參加的文化團體，書寫的格式、慣用語、遣詞用字，無一不是研究當時文化的重要成分。傅錫祺、陳懷澄的日記常有向上海訂購書籍的記載，而陳懷澄經常自雅堂書局、蘭記書局購書，日治時期傳統書局在民間閱讀供需上扮演的角色清楚可見。透過記主所載閱看的書刊、雜誌，可一窺當時流行的事物為何？這對了解當代文化面相，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4.由政治事件的發生，理解記主對事件的看法，以及當時政府的作法。如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臺灣人如何了解這件事？是同情原住民，還是與殖民政府看法相同？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們何時得到此一消息？又聽聞消息後的感想，或甚至沒有敘及。事件發生當日，陳懷澄日記有「霧社蕃變殺人甚多，飛行隊至。」⁷⁶的記載，以後不再有相關記載；林獻堂同樣也在27日得知此事：「晚聞趙根說午後二、三時在臺灣新聞社前看揭示，本朝在霧社開運動會，生蕃反面殺死數百人，郡守、警部死生未詳云云，其記事旋被禁止。」⁷⁷林獻堂所處的霧峰，因較近埔里，無論霧峰警局的警員調往埔里支援、飛機的應援，接連兩天都有記載。因此研究霧社這類的政治事件，日記資料有一定的重要性。

（三）擴充「臺灣日記知識庫」的內容

目前中研院臺史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已放入九種日記（八套日記及一套回憶錄），今後尚可努力之處有如下二項：

1.已出版的日記陸續由後臺推向前臺：已出版的日記分為中研院臺史所出版和所外出版兩部分。所內由於有販售的壓力，因此書籍銷售到一定數量、年限後才會陸續推出；至於所外，則必須多方交涉才能取得家屬、出版單位、解讀者／編

⁷⁶ 陳懷澄，〈陳懷澄日記〉（未刊稿），1930年10月27日。

⁷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1930年10月27日，頁359。

輯者同意，方可進行，難度較高。如以目前可和臺史所搭配的日記有〈吳鴻麒日記〉（未出版）、《葉榮鐘日記》（已出版）、《鍾理和日記》（已出版）、《劉訥鷗日記》（已出版）、《楊英風日記》（已出版）、《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吳平城著，已出版）、馬偕《馬偕日記》（共三冊）；而目前也在進行清代來臺官員日記的註解，如羅大春《臺灣海防開山日記》、蔣師轍《臺游日記》。另有書中已有加注的《宦海日記校注》，⁷⁸ 但因《宦海》一書已在中國出版，因此交涉上可能會遇到困難。

2. 相關單位建置日記史料的資料庫時如能採用同一規格：將來使用時可聯合檢索，可望給讀者帶來更多的便利。

（四）增加利用日記資料的研究者、定期召開研討會

雖如上述，已有不少年輕學子利用日記撰寫其博、碩士論文，但研究體系和大學院校能持續關注日記資料的研究者並不多。

1. 目前較重要的研究者以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及臺史博部分研究人員為主。在大學任教者有政大臺文所曾士榮副教授、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廖振富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副教授、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李毓嵐助理教授。

2. 曾參與日記解讀者，茲列舉如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素芬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張季琳副研究員，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林蘭芳副教授，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鴻圖副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楊麗祝副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呂紹理教授、陳翠蓮教授，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李力庸教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鄭麗榕助理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吳奇浩助理教授（已故），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何義麟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林丁國助理教授，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高雅俐助理教授等等。

（五）加強與國外學者交流

了解日記在各國史料群中是否扮演不同的角色？日記能解決什麼樣的歷史問題？日記的書寫手法、描述內容有何異同？日記可否分類、如何分類？如何組織跨國研究日記團隊、有何困難？如何推動日記研究？如能有任務型的計畫，讓

⁷⁸ 曹士桂撰、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編，《宦海日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各國人士加入研究行列，加強學術交流，較容易看到研究成果。

2014年筆者應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之邀，參與其主辦的「日記與多樣化的近代」研討會，共有臺、韓學者6名發表論文。其中本人的題目由主辦人鄭炳旭副教授指定。茲依發表順序介紹題目如下，其中1、3、5為臺籍。

1.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回顧與展望〉。就臺灣現階段日記的研究現狀，做一介紹（如本文）。

2.廉仁鎬（首爾市立大學國史學科），〈中國朝鮮族辯士海元之人生與日記〉。海元日記自1963.7~2004年，共87卷，為作者所購得。他將海元（1937-?）的生涯分成四個階段來研究：（1）1963.7~1966.5，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的紅色辯士；（2）1966.6~1976，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奮鬥與苦難；（3）1976~1992，改革開放時期的混沌與挫折；（4）1992~2004，與另一個「祖國」——韓國的相遇。海元在文革時痛失其之前的日記，他表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部分已經沒有了，對海元來說，「日記是向後人展示人生如何的一種存在」。

3.李毓嵐，〈臺灣男性日記中的女性身影〉。由於一直以來，女性的日記相對於男性少許多，因此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日記中女性的資料亦可參考。但男性隨其性格、書寫習慣，對女性直接的看法可能帶有偏見，使用資料時必須理解此一背景。

4. Julian Biontino（首爾大學），〈「萬物生滅無常，惟主道永存」：尹致昊日記裏的「生死觀」〉。尹致昊（1864-1945）在韓國近代史上可謂傳奇人物，他是基督徒。本文介紹他對前、後兩任妻子完全不同的感情和作法；明成皇后遭暗殺後，皇室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及他參加國葬時所感受到日本人的侮辱；其次記錄日本人為了開礦而買賣尹致昊父親墓園附近之地，後墓地受到侵犯，他努力折衝的過程。最後一節才談到生死觀，主旨在尹皈依基督教，故接受該教的生死觀，亦即死後是一個更加幸福的世界。

5.曾品滄，〈酒樓滄桑史：日治至戰後初期臺灣之市民公共空間的興起與衰微〉。本文旨在以酒樓的發展為例，反駁過去研究者認為臺北市的發展，是一種沒有主體建構過程的現代性，欠缺市民的、自主的空間。由日記資料，可知酒樓在近代臺灣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說明日治時期臺灣民眾自我創造公共空間的可能性，並藉在此從事各項活動，而凝聚出漢人自我認同意識的可能。

6.張信（成均館大學），〈日治下刑務所之思想轉向工作與轉向者的處遇：金玼燮之「獄窓日記」為中心〉。〈獄窓日記〉為韓國名詩人、獨立派金玼燮在牢中3年8個月（1943.11.10～1944.9.5之間）所留下的日記。作者認為金之所以提早假釋，乃因他在獄中「轉向」所致，但日記中並未明確書寫。本文首先探討金入獄乃因牽連共產黨事件所致，以及朝鮮總督府如何在西大門刑務所對金展開各種促使他轉向的工作，之所以能寫日記，因為他已升級為三級囚犯。作者特別提出，新修訂的治安維持法，不僅處罰已有具體事實者，且將預備結社者和與結社無關的個人行為也視為直接懲治的對象，使金成為思想犯、非國民，再藉由轉向而成為國民。⁷⁹ 上述論文，韓方預計在2015年初以韓文出版。

臺方學者由於能夠運用的史料較多，故多用數種以上的日記為主要材料，韓方則利用單一日記來研究記主生平、思想與其轉變。韓方表示由於日記大半在個人手中，既未解讀、也未公開，更無資料庫，使用上、研究上較為不便。即使如此，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的HK韓國文化研究團（Human Korea是韓國政府的人文科學研究據點形成的計畫）在「文化動學」（cultural dynamics）這個框架下，亦即為了明瞭自「傳統時代」到現代動態的、立體的韓國文化，推進種種研究計畫。其中，「個人的傳統與近代」研究群，以個人的生平為主軸，除了檢討「近代化」的過程，也要解明對個人而言，「傳統」與「近代」的意義。為此，2011年初以韓國的研究者為中心，加上幾位日本研究者組成研究群，使用的主要資料為日記。2013年出版韓文《通過日記看見的傳統與近代、殖民地與國家》一書，做為最初的研究成果。書中論文是將2012年6月8-9日召開、與書名相同的研討會論文編輯而成，該研討會有韓國、日本、德國學者12名參加，以三種語文報告、討論，不只共同點是以日記這種紀錄形態為中心，也進行了充分的意見交換。⁸⁰

上述論文集，2014年3月出版日文版，書名為《日記が語る近代：韓国・日本・ドイツの共同研究》，由日本同志社韓國研究中心出版，其中內容與韓文版略

⁷⁹ 鄭昞旭編，〈「日記與多樣化的近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主辦，2014年5月31日。

⁸⁰ 鄭昞旭、板垣竜太，〈はじめに〉，收於鄭昞旭、板垣竜太編，《日記が語る近代：韓国・日本・ドイツの共同研究》（京都：同志社コリア研究センター，2014），頁7。

有不同。⁸¹ 共分 5 部分，一是由個人記錄描寫歷史；二是近世的生、死；三是被異民族支配；四是在植民地下生存；五是迎接沒有解放的「解放」，共 12 篇論文。

臺灣雖在 1999 年開始解讀日記、2000 年開始出版日記、舉辦日記相關研討會，但因未與國外學者交流，國外難以得知臺灣已有的成果。相較之下，韓國日記的集體研究始於 2011 年，走國際路線，又出版研究成果，較容易曝光，其做法可為他山之石。

五、結論

日記是近十多年來陸續出土的資料，具連續性、長期性、跨時代性。由於臺灣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國民黨政府統治，在臺灣史研究上經常視為兩個斷代，研究者往往各挑一個斷代研究，導致歷史的延續性被割裂，日記正是衝決斷代、結合兩個時代重要而關鍵性的史料。過去臺灣很少有本土政權，均由外來統治者進入臺灣，掌握絕對的治理權，這種現象被法律學者王泰升稱為外來政權。⁸² 統治者留下大量的史料、檔案、論著，強調統治的治理性，歌頌政績，被統治者的看法、心聲一向忽略；有了記主在日記中留下的觀點，頗能站在人民的立場來顛覆一些傳統的看法。日記在研究記主、家族史、生活史、精神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日記畢竟是個人主觀的看法，因此在使用前必須了解其有限性，並經考訂為宜。臺灣學界，尤其博、碩士論文引日記為重要史料者漸有增加，而中研院臺史所也大力建置「臺灣日記知識庫」，推廣日記史料。今後擴增「臺灣日記知識庫」中的日記，以解讀做為研究日記、形成學術社群的方法，增加研究日記學者的數量，舉辦工作坊、學術研討會，進而與國外學者交換心得，以提升日記研究的層次，方能知己知彼，充分進行學術交流。

⁸¹ 卷頭語譯成日文時篇幅增加，有些論文做了訂正、某些論文增加圖片，兩篇德文的論文，並非重譯，而是譯自德文，也多收錄了一篇文章。

⁸² 所謂外來政權，係指該政權從臺灣島外將其既有的統治組織及人員移入臺灣，以遂行統治之謂。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29、43-45、380。

引用書目

《大公報》

《民報》

陳懷澄，〈陳懷澄日記〉，未刊稿。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刊稿。

陳岑，〈陳岑女士日記〉，未刊稿。

王泰升

1999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麗蕉

2014 〈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介紹〉，收於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282-28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

2001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白聖長老

2009 《白聖長老日記（一）至（廿二）》。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修訂再版。

吉成勇（編）

1994 《日本「日記」總覽》，歷史讀本特別增刊第 21 号。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何金生（著）、何家班（整理）

2005 《翻山越嶺三年汗：全省山地走透透的省議員》。未著出版地、出版者。

2006 《百里侯掠影》。未著出版地、出版者。

佐伯有清

199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歷史讀本特別增刊第 21 号，頁 74-75。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佐藤進一

1994 〈日記の分類〉，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歷史讀本特別增刊第 21 号，頁 36-38。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吳南圖

2007 〈序〉，收於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頁 9-10。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呂芳雄

2004 〈後記：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收於呂赫若著、鍾瑞芳譯、陳萬益主編，《呂赫若日記》，第 2 冊：（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頁 457-493。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

2004 《李春生著作集（4）：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天演論書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

2000 《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東京：総和社。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

2003 《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林丁國

2008 〈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791-84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博正

2000 〈《灌園先生日記》序〉，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ii-v。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編)

2014 《内海忠司日記(1940-1945)：総力戦体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

2012 《内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阿部賢介

2013 《關鍵的七十一日：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向》。臺北：國史館。

洪 縉(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3 《瀛海偕亡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范燕秋

2008 〈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731-78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高雅俐

2008 〈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1920-1930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841-90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

2012 《馬偕日記》。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來新、許秦蓁(編)、彭小妍、黃英哲(編譯)

2001 《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上、下冊。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張漢裕（主編）

2000 《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張麗俊（著），許雪姬、李毓嵐、洪秋芬（編纂解說）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莊勝全

2013 〈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臺灣史研究》20(3): 207-220。

許伯埏（著），許雪姬（監修），蔡啟恆、川島真（日本語編集）

1996 《許丙·許伯埏回想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時嘉

2013 〈〈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20(4): 179-204。

許雪姬

1998 〈林熊祥先生事蹟考：日治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三〉，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37-46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999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167-211。

2002 〈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於胡健國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989-1061。臺北：國史館。

2005 〈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9-121。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8 〈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 151-178。

2011 〈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師大臺灣史學報》4: 3-65。

2012 〈戰後史觀與臺灣史研究（1945年7月-1987年7月）〉，收於呂芳上主編，《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頁 157-176。臺北：國史館。

2013 〈跋：《灌園先生日記》全套廿七冊出版完成記〉，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頁 493-5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14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週報》1460: 5-7。

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

1998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彭翰

1947 〈臺灣《自治》陰謀案紀詳〉，《現實》1: 5-8。

曾士榮

2013 《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北：稻鄉出版社。

曹士桂（撰）、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編）

1988 《宦海日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馮爾康

2006 《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刷。

黃天才、黃肇珩

2005 《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08《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一九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2008《黃旺成先生日記（二）一九一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2009《黃旺成先生日記（三）一九一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

2009《黃旺成先生日記（四）一九一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

2007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臺北：國史館。

黃富三

2005 《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

2014 《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楊麗祝

2008 〈獄中日記三則：蔣渭水、簡吉與賴和〉，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311-37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葉郁菁

2007 〈臺灣移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國際文化研究：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報》3(1): 55-76。

德永康元

1994 〈私の日記論〉，收於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総覧》，歴史読本特別増刊第21号，頁38-40。東京：新人物往来社。

鄭孝胥（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

1993 《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

鄭炳旭（編）

2014 〈「日記與多樣化的近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主辦，2014年5月31日。

鄭炳旭、板垣竜太

2014 〈はじめに〉，收於鄭炳旭、板垣竜太編，《日記が語る近代：韓国・日本・ドイツの共同研究》，頁1-11。京都：同志社コリア研究センター。

謝金蓉

2006 《青山有史：臺灣史人物新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金蓉（編著）

2005 《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鍾平山

1985 《教會日知錄》。臺北：弘智出版社。

鍾理和（著）、鍾鐵民（總編輯）

1997 《鍾理和全集 5：鍾理和日記》。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蘇瑤崇（主編）

2004 《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6 年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Gully, Robert et Dunham Frank

1844 *Journal Kept by Mr. Gully and Captain Dunham during a Captivity in China in the year 1842.*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Diary Research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sueh-chi Hsu

ABSTRACT

The past two decades had seen increasing discovery of diary materials and their growing importance as a source material for research, complementary to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Diary series stretching over years and across eras not only contain crucial insights of the past epochs but also offer historical narratives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f commoners rather than those in power, thus making dairy materials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Diary research in Taiwan began in 1991 with the study of Lin Hsien-t'ang's diary, followed by its publi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Diary Knowledge Bank. From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diary contents, the emphasis of diary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pers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of individual diarists as well as the prevalent mood and thinking of the times. Moreover, examining the reactions of diarists toward events would shed light o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Keywords: Diary, Diary Research, Taiwan Diary Knowledge Bank